

戰時東亞殖民地作家的變奏

——朝鮮作家張赫宙與台灣作家的交流及其比較*

王惠珍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張赫宙（1905-1997）曾是戰時台灣日語作家們最為熟知的朝鮮作家名字，但戰後因韓國分斷體制，親日作家研究成為文學禁忌之一，使他成為一個「被遺忘」的名字，隨著時勢變遷禁忌的破除，張赫宙研究漸受矚目。

本文首先將介紹這位聞名於戰前日本帝國文壇的朝鮮作家張赫宙的生平背景，及其他在日、鮮文壇的文學活動，釐清他榮獲《改造》懸賞創作獎的指標性意義。其次，探討他的獲獎對於同是殖民地出身的台灣文學青年產生怎樣的效應與影響？在戰前殖民地交流史中，他與台灣文壇的具體交流情況為何？他來台出版《新しき出発》的意義為何？最後，探討從三〇年代帶有普羅色彩所謂同伴作家的張赫宙，為因應「讀者」之需，抹上「異國情調」，轉而隨國策起舞「變奏」，對其他殖民地作家雖具示範性作用，但日、台評論者如何將台灣作家與他進行比較？筆者期待從南國殖民地「台灣」的視角，重新檢視北國朝鮮作家張赫宙前進中央文壇後，擴及大東亞文學共榮圈的文學活動。

關鍵字：張赫宙、朝鮮作家、親日作家、中央文壇、台灣作家

* 本文為2008年度國科會計劃「東亞殖民地作家的變奏:台灣作家的張赫宙想像」(NSI97-2410-H-007-54)部分研究成果，承蒙補助，謹此致謝。本文的日文稿曾於「第八屆日本台灣學會關西部會學術研討會」發表，承蒙評論者布袋敏博教授賜教，及《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的二位匿名審查者，提供諸多寶貴意見，謹此致謝。最後，感謝協助文稿校對的清大台文所的蔡佩含同學。

Deviation of East Asia Colonial Writers During Wartime:

Comparis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Jang Hyukjoo and
Taiwanese Writers

Wang, Hui-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o many Taiwanese writers composing in Japanese during wartime, Jang Hyukjoo (1905-1997) us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Korean writers. However, due to the political facts of two Koreans after WWII, research of pro-Japanese writers was a taboo, and thus the name of Jang was made “forgotte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s time goes by and prohibition loosens, research of Jang, who was once an important writer and whose name really existed in documents of Taiwan literature, gradually regains its deserved attention.

This thesis at firs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is Korean writer, who was well-known in mainstream literary circles of Japanese empire before war, and his literary activities in Japan and Korea, to illuminate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being awarded by 《改造》 magazine. Second, the impact and repercussion his being awarded made to the Taiwanese literary youths, who are also the colonized, will be the main issue. Jang’s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s with Taiwanese literati, as well as the meaning of his publishing 《新しき出発》 in Taiwan, will also be discussed. The final part of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process and reason of Jang’s alteration. Originally being an somewhat proletarian writer in 1930s, Jang afterward danced to the tune of national policy, changed himself according to need of his “readers”

and added some “exoticism” to his works. This alteration was intended to have demonstrative effects to other colonies, but what was the truth about how critics in Japan and Taiwan compared him with other Taiwanese writers? This thesis tries to, from a perspective of southern colony Taiwan, reexamine Jang’s traces of literary activities from Japanese mainstream circles to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of literature.

Keywords: Jang Hyukjoo , Korean Writers, Pro-Japanese Writers, Mainstream Literary Circles, Taiwanese Writers



戰時東亞殖民地作家的變奏

——朝鮮作家張赫宙與台灣作家的交流及其比較

一、前言

張赫宙（1905-1997）是戰前台灣日語作家們甚為熟悉的朝鮮作家，但戰後無論是在韓國現代文學史，抑是日本文學史中卻是個「被遺忘」的名字。戰後韓國因分斷體制的關係，越北作家¹和親日作家研究討論成為韓國近代文學研究的兩大禁忌。1987年始對戰後越北作家在北朝鮮的生活處境才漸有所了解。1965年日韓雙方因締結「日韓基本條約」，才使得1910年「韓日合併條約」失效，遲至1988年左右親日作家的研究才逐漸被接受。近年來東亞區域文化比較研究相形熱絡，韓國學界的民族文學論述等展開更多元的思辯討論，也逐漸被譯介來台。²因此，日本舊殖民地作家的比較研究，進入了另一個對話與研究的新階段，本文將以戰前台灣讀者最為熟知的朝鮮作家張赫宙，作為比較戰前台、韓文學研究的楔子。

戰後張赫宙因被劃歸為親日作家，而被塵封於帝國殖民的歷史記憶中。1965年任展慧的論文〈張赫宙論——付・1945年以前の在日朝鮮人文学關係年表〉³才始以「民族」的觀點檢視張赫宙的文學，將他視為在日朝鮮作家「墮落」者的代表，並以金史良與之對比，兩人分別承擔了殖民地朝鮮作家屈辱／反抗、親日／抗日兩個對照的形象。之後，研究者也習於將兩人進行對照性比

1 越北作家意指韓戰期間（1950.06.25-1953.07.27）前往北朝鮮的作家，如李泰俊、朴泰遠、安懷南等人。

2 其中有白永瑞的《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9.09）、白樂晴的《分斷體制・民族文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11）等。

3 任展慧，〈張赫宙論〉，《文學》33卷11期，（1965.11），頁84-97。

較研究。⁴兩人因同屬「在日」朝鮮作家，韓國文學史⁵的殖民地時期裡的相關著作，並未將兩人的作品納入檢討範疇，顯然韓國文學史主要是以「朝鮮語」文壇作為主要的論述範疇，將「在日」朝鮮作家排除於國家民族文學論述中。

關於張赫宙的研究相隔近十八年後，1983年方有林浩治〈張赫宙論——十五年戦争下の朝鮮人作家の軌跡——〉⁶的發表。2002年11月由布袋敏博主編《張赫宙小説選集》（太學社），將張赫宙的日文作品譯成韓文出版，隔年在日本覆刻出版《張赫宙日本語作家作品選》，⁷而該選集的主編白川豐和南富鎮也曾撰寫多篇張赫宙的作家與作品相關研究論文等。⁸

2007年亦有兩本博士論文的產出，⁹其中辛承模的博論中，他以在朝日人作家湯淺克衛和在日朝鮮人作家張赫宙為例，說明殖民地日語文學混雜文化認同之產生、經過和挫折的過程。辛試圖跳脫「親日」和「抗日」的二元對立分析圖式，立足於張赫宙的時代位置，探討他的親日「過程」，同時進一步釐清張赫宙文學的連貫式文學主題，強調張在戰時摸索「內鮮一體」的「過程」，和他在「親日」的過程中，遭逢怎樣的挫敗。戰後，他又如何轉而以完成他的「日語文學」為目標進行創作。

- 4 川村湊，〈金史良と張赫宙——植民地人の精神構造——〉，《近代日本と植民地：抵抗と屈從》（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05.09），頁205-234。
- 5 因筆者不諳韓文因而只能搜尋中、日譯本。如金學鉉編譯，《朝鮮の抗日文學》（日本東京：柘植書房，1977.02）、趙潤濟著，《韓國文學史》（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05）、金允植等共著，金香、張春植譯，《韓國現代文學史》（中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04）、何鎮華，《朝鮮現代文學史》（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04）等。
- 6 林浩治，〈張赫宙論——十五年戦争下の朝鮮人作家の軌跡——〉，《季刊三千里》36號（1983.11），頁209-222。
- 7 如南富鎮、白川豐編，《張赫宙日本語作家作品選》（日本東京：勉誠出版，2003.10）。
- 8 白川豐，《殖民地朝鮮の作家と日本期》（日本岡山市：大学教育出版，1995.07）的第二部為「張赫宙研究」，以張赫宙戰前的文學活動為主要的探討內容。《朝鮮近代知日派、苦闘の軌跡：廉想涉、張赫宙とその文学》（日本東京：勉誠出版，2008.10）以張赫宙戰後的文學活動為主要的探討內容。南富鎮，〈第七章 近代への方向と挫折——張赫宙論〉，《近代文学の「朝鮮」体験》（日本東京：誠勉出版，2001.11），頁245-282。〈「內鮮結婚」の文学——張赫宙の日本語作品を中心に〉，《人文論集》55卷1期（2004.03），頁181-210、〈日本近代文学のアジア（6）張赫宙の朝鮮と日本——日本語への欲望と近代への方向〉，《アジア遊学》52卷（2003.06），頁145-153、〈張赫宙文学と近代への挫折〉，《日本文化研究》11期（2000.03），頁41-61。
- 9 辛承模的《殖民地日本語文学の混淆性：張赫宙・湯淺克衛の文学を中心に》（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學，2007.11）和金淑貞的《張赫宙文学の研究：「十五年戦争」下の「在日」作家》（日本東京：日本大學，2007.03）。

金淑貞的博論《張赫宙文学の研究：「十五年戦争」下の「在日」作家》是將張赫宙置於「在日」朝鮮文學的系譜脈絡中，重新檢視1931年至1945年間「在日」朝鮮作家張赫宙的文學創作活動，分析他戰時所書寫的文本。其中又針對任展慧因《加藤清正》¹⁰一作，將張赫宙貼上親日作家標籤的說法，提出異議，任雖從抗日精神的觀點推舉金史良為「在日」文學的始祖之說，但作者卻以「在日」作為討論的空間範疇，試圖強調「在日朝鮮文學」系譜中，張赫宙文學的重要性和代表性，藉此為張赫宙於「在日」朝鮮文學史中重新定位。

作家比較研究相關討論，主要有張赫宙與楊達的比較研究，如山口守〈想像／創造される植民地——楊達と張赫宙〉¹¹較為深入，檢討日本普羅文學界如何看待這兩位作家的出現，對他們又有怎樣不同的評價。另外，李文卿的〈帝國中的朝鮮像：朝鮮的「親日文學」〉則在大東亞文學圈的框架中，討論張赫宙在戰爭後期作為「親日」作家的角色及其創作活動。¹²但戰後台灣文學界關於戰前朝鮮作家張赫宙的認知，一般大都僅止於本名呂石堆的呂赫若的「赫」字取自朝鮮作家張赫宙的「赫」，所謂的「年輕的張赫宙」（若い張赫宙）¹³一說。另外，龍瑛宗1937年榮獲《改造》懸賞創作獎時，亦被譽為「台灣的張赫宙」等片段性的說法。張赫宙究竟是誰？為何成為戰前台灣作家爭相推舉仿效的文學家，楊達邀稿對象？另外，中國的胡風、范泉又為何競相翻譯他的作品？胡風編的《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¹⁴收有〈山靈〉、〈上墳

10 張赫宙，《加藤清正》（日本東京：改造社，1939）。

11 山口守，〈創造／想像される植民地——楊達と張赫宙〉，《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日本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2005.05），頁77-100。雖然之前有金尚浩的〈楊達與張赫宙普羅小說之比較研究——以「送報伏」與「餓鬼道」為例〉（《楊達文學國際會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主辦，2004.06.19-20）一文，簡單地介紹了張赫宙的生平和〈餓鬼道〉的內容，和當時幾位評論家對該作品的評價，所使用的資料大都轉引白川豐的《張赫宙研究》（韓國首爾：東國大學大學院博士學位論文，1989），並未針對文本進行較細膩的耙梳比較。

12 李文卿，〈帝國中的朝鮮像：朝鮮的「親日文學」〉，《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稻鄉出版社，2010.07），頁288-318。

13 巫永福，〈呂赫若的點點滴滴〉，《巫永福全集》（台北：傳神出版社，1999.06），頁116。

14 胡風編，《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中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04）。

去的男子〉，中文雜誌也譯有張赫宙介紹朝鮮的作品，¹⁵戰後尚有范泉編譯的《朝鮮風景》等作品。¹⁶因此，不禁令人想問，在日本帝國支配下的「東亞讀者」究竟如何認知張赫宙這位朝鮮作家？

本文首先將介紹這位聞名於戰前帝國文壇的朝鮮作家張赫宙的生平背景，及其他在日、鮮文壇的文學活動，釐清他榮獲《改造》懸賞創作獎的指標性意義。其次，說明他的獲獎對於同是殖民地出身的台灣文學青年產生怎樣的效應與影響？在戰前殖民地文化交流史中，他與台灣文壇的具體交流情況為何？最後，探討從三〇年代帶有普羅色彩所謂同伴作家¹⁷的張赫宙，到戰爭期間的「變奏」¹⁸對其他殖民地作家雖具示範性作用，但台灣作家又如何看待他的轉變？日、台評論者如何將台灣作家與他進行比較？期待從南國殖民地台灣的視角，重新審視北國朝鮮作家張赫宙前進中央文壇後的文學活動。

二、張赫宙生平及其文學活動

張赫宙是活躍於戰前日本帝國文壇的知名朝鮮日語作家，1905年出生於朝鮮慶尚北道大邱府的大地主之家，本名張恩重，因庶出身，而隨生母在朝鮮南部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其生長經驗帶給他一生揮之不去的孤獨感與自卑感。1926年畢業於大邱普通學校，求學期間曾接觸過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後，即在慶北擔任普通學校教員。1929年雖曾以朝鮮語創作，但作品卻未被

15 張赫宙的中文譯作。

作者	譯者	篇名	期刊	頁數
張赫宙	王笛	被驅逐的人們	《文學雜誌》1卷3-4期（1933）	79-97
張赫宙	黃源	叫作權的男子	《文學》7號（1934）	缺
張赫宙	馬士	朝鮮文學近狀	《客觀》1卷7期（1935）	14
張赫宙	蔣俊儒	朝鮮文壇的作家和作品	《文海》1卷1期（1936）	56-58

參考資料：「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http://www.dachengdata.com.nthulib-oc.nthu.edu.tw/search/search.action?kanpian=2&field=3&sw=赫宙>

- 16 張赫宙著，范泉譯，《朝鮮風景》（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08）。另外，他尚譯有張赫宙的《黑白記》未見。
- 17 同伴作家主要是指作家雖然認同社會主義的部分觀點，但並未直接參與普羅文學運動者。
- 18 張赫宙未真正參與左翼文學活動，也未因參與左翼活動被捕入獄宣告「轉向」，以他的文學經歷而言，充其量只能稱為同伴作家，因此筆者認為他的文風轉變無法以「轉向」視之，只能稱為「變奏」。

採用，因而轉以日語創作，並決意以「日語」寫作進軍日本文壇。

1930年結識農本主義作家加藤一夫（1887-1951），在加藤所主編的《立足大地》（大地に立つ）發表文壇處女作〈白楊木〉，此時的作品帶有素樸的寫實主義，思想則較接近無政府主義。1932年27歲以〈餓鬼道〉一作入選《改造》懸賞創作獎第二名（第一名從缺），正式進入日本文壇。在東京《改造》入選者招待會中認識《文藝首都》主編保高德藏，並結識當時許多文壇重要的作家。之後，他便往返於大邱、東京之間，1936年因受到千葉龜雄的書信鼓勵，決定移居東京，專心從事文學創作活動，企求在日本文壇嶄露頭角，成就個人的文學事業。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1939年公然昭告個人將走上「親日路線」，接著參與華北、滿洲視察和取材旅行活動等。1943年成為皇道朝鮮研究委員會委員，撰寫《岩本志願兵》、《開墾》等具時局色彩的作品。在1930年至1945年期間共發表小說長篇20篇（含朝鮮語1篇）、短篇85篇（含朝鮮語7篇），單行本31冊（含朝鮮語1本，在台出版的《新しき出発》）。在日本文壇中以書寫朝鮮人生活為主要創作題材，在質、量上皆受到高度關注。戰後定居日本埼玉縣歸化日本籍，改名野口稔，繼續從事書寫工作。

孫喜才根據張赫宙處理的題材內容分為三個時期：初期（1930-1939）、中期（1939-1945）、戰後三個時期。初期作品題材以佃農、地主、都會上班族等人物為主要的刻畫對象，描繪他們的封建性、小市民性及轉向問題等。中期作品則集中於處理滿洲開拓、內鮮一體、歷史題材等具國策性的文學。戰後則以人道主義的立場，描寫戰後東京和朝鮮戰爭為主。¹⁹

張赫宙的作品中因常將敘事重點置於小佃農與地主的關係上，排除殖民地現況，使得他的作品欠缺作者自身對殖民支配者的批判意識，而是將批判點聚焦於朝鮮傳統社會本身的「封建性」，如〈白楊木〉、〈餓鬼道〉、〈迫田農場〉、〈山靈〉等作品。「利己性」的問題，如《仁王洞時代》裡作者以都會

19 孫喜才，〈張赫宙文学における連続と非連続〉，《日本文化の連続性と非連続性：1920-1970》，（日本東京：勉誠出版，2005.11），頁141-180。

上班族為主要的描寫對象，撇開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問題，直接刻畫描寫抱持利己主義，以家庭生活為優先考量的小市民之人物形象。作品雖以朝鮮社會為舞台背景，卻不直書殖民地的支配現況，而是想凸顯作家的創作意識與理念，如此不願為意識形態代言，欲求中立而客觀的創作態度，讓他置於不落入於當時刻劃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典型人物的俗套窠臼中，²⁰但這也成為張赫宙文學被論者詬病之處。

戰後張赫宙的文學則強調「生活」和「家」的價值，因被劃歸為「親日派」作家，遭受在日朝鮮人左右兩派的夾擊。但畢竟文學是他的最愛，也是他的營生之道，他仍執筆不輟。白川將其戰後文學活動劃分成三期。第一期自1945年至1953年，以「張赫宙」發表《孤兒們》（《孤兒たち》，萬里閣，1946年）、《人的善惡》（《人の善さと悪さと》，丹頂書房，1947年）、《李王家秘史——秘苑的花》（《李王家秘史——秘苑の花》，世界社，1950年）、《嗚呼朝鮮》（新潮社，1952年）等。第二個時期是自1954年至1975年以「野口赫宙」為筆名，處理疾病題材的《黑色地帶》（《黒い地》，新制社，1958年）、《癌症病棟》（《ガン病棟》，講談社，1959年），推理題材的《湖上的不死鳥》（《湖上の不死鳥》，東都書房，1962年），歷史小說的《武蔵陣屋》（1961，雪華社）。第三期1976年之後，預計在日發行英文小說《無盡的旅途》（《果たして無き旅路》）（共五卷）、《韓和倭》（《韓と倭》，1977年）、《在瑪雅·印加中追逐繩文人》（《マヤ・インカに縄文人を追う》，1989年）等。晚年他捨棄祖國的韓文和委身之處日本的日文，希望跨越民族的藩籬成為世界性的作家，改用英語創作固守自己自由的創作園地，不願為意識形態所左右，是他創作生涯中一貫的堅持。²¹台灣日語作家戰後為「跨語」所苦，但在張赫宙的身上卻看到他駕馭多語的才華，和他極欲逃脫語言問題對其文學創作干擾的努力。最後，他與台灣多數的日語作家一樣，成為「讀者」已不在，被時代所遺忘的殖民地作家。

20 同註19。

21 白川豐，〈付論：戦後の張（野口）赫宙〉，《殖民地朝鮮の作家と日本期》，頁223-226。

在戰前朝鮮文壇張赫宙一直是位頗具爭議的人物。他因撰寫〈文壇的好菌〉（〈文壇のペスト菌〉）與朝鮮文壇之間產生一些齟齬。又，1938年10月的「朝鮮文學的將來」座談會上，因張赫宙翻譯的古典文學〈春香傳〉，引發朝鮮語「翻譯可能性」的議論，會中他不甘示弱與其他朝鮮作家針鋒相對激烈爭辯，會後憤而寫了〈訴諸朝鮮知識人〉（〈朝鮮の知識人に訴ふ〉）一文，正式與朝鮮文壇決裂。他之所以如此反應過度，根據白川的推測除了成長經驗帶來的自卑感之外，與朝鮮社會崇尚文風，他因非「兩班」²²出身，只有普通高中學歷，又未有留學資歷，出現所謂自尊心過剩的現象，甚至出現被害妄想症的傾向有關。他只要一遭受到批評，情緒容易過度反應，立即為自己辯解，如此激烈的情緒反彈內外皆然，也直接反應在他的作品中。²³如此的景況在後述中，其尖銳地駁斥日本文壇普羅系的評論家與朝鮮文壇人士的態度與遣詞用字，便可窺其一二。

張赫宙與朝鮮文壇針鋒相對引發種種爭論，其中卻帶出了朝鮮語「翻譯可能性」的問題與朝鮮民族性的討論等。關於翻譯朝鮮文學的問題，當時在1938年10月舉辦的「朝鮮文化的將來」座談會²⁴中，鄭芝鎔、林和、俞鎮午、李泰俊等朝鮮作家皆主張「朝鮮文學」翻譯相當「困難」，有其不可能性。其內在動機不外乎是出自於「反抗」的理由，即是擔心以帝國語言作為翻譯語言，將危及朝鮮文化的固有性，成為日語創作的爪牙。²⁵但諷刺的是，之後，持反對意見者之中，竟有多位的作品陸續被譯成日文作品。甚至後來，金史良也提議應設立翻譯機構，朝鮮文學的日譯問題在此過程中受到關注。最後，演變成為政治性（國策性）的文學作品大都以日語書寫，一旦擇選「翻譯」題材時，即回歸具朝鮮性的作品。從中可看出朝鮮作家們執著於區隔日語創作的「體制

22 「兩班」是古代高麗國和李氏朝鮮的世族統治階級，類似中國的士大夫階級，分文班（東班）、武班（西班），採半世襲制。（資料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9%E7%8F%AD>）

23 白川豐，〈廉想涉と張赫宙——朝鮮近代作家の二つの「生」と文学〉，《朝鮮學報》203輯（2007.04），頁1-29。

24 「朝鮮文學的將來」座談會的對話內容刊載於《文學界》1月號（1939.01）。

25 南富鎮著，〈「翻譯」の政治性——戰時期における朝鮮文学の翻譯をめぐる時期〉，《靜岡大学人文論集》57卷2期（2006.01），頁56。

協力」和翻譯「朝鮮性內涵」。特別是戰爭期出現的日譯活動多潛藏著「政治性」，即是在朝鮮語和朝鮮文化的消失危機中，譯者希望透過翻譯朝鮮文化的活動，摸索保存「地方文化」的方式。換句話說，即是日語創作雖被視為呼應內鮮一體的國策實踐，但在翻譯活動中他們卻可以擇譯許多以朝鮮民族主義為基礎的作品。日語創作反映出「日本的政治性」表現於外，翻譯活動卻反映「朝鮮的政治性」，潛藏於內。雖然這些文化活動都統攝在殖民主義之下，卻充滿政治性的操弄。對朝鮮方面而言，日譯朝鮮文學的過程中多少可投射出朝鮮本身的政治性。²⁶ 雖然張赫宙點起「翻譯可能性」爭議之火，但卻為戰時朝鮮文學燒出一條可行之道。台灣四〇年代出現作家譯介中國古典白話小說之風，雖然譯者的翻譯動機互異，但在漢文空間受擠壓的情況下，卻得以以「日語」流布中國白話小說的內容，可見，在大東亞日語文化圈的戰時文化活動中，「日語」扮演共通語的角色，翻譯實踐活動看似一條對外與其他地域文化溝通之路，但竟同時也是一條折返己身傳統文化之途，即便其中充滿著政治性的操作，但在「翻譯」此一文化轉換工程裡，卻創造更多受殖者與殖民者的文化協商空間。

知識分子討論民族性的問題中外屢見不鮮，但張赫宙卻為了駁斥朝鮮文壇對他個人前進中央文壇的獲獎反應，而挑起此一爭議。他逐一將朝鮮文壇對他的負面評語如〈餓鬼道〉「因為朝鮮人寫的才當選」；〈被追逐的人們〉「只不過是介紹文」；〈叫權的男子〉、〈ガルボウ〉是「應該唾棄的作品」，他以讀者投書的形式寫了〈文壇中的好菌〉（〈文壇のペスト菌〉）一文加以駁斥，直指朝鮮文壇的「嫉妬心」、「猜疑心」等弊害。上述的殖民地文壇反應與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文獲獎時，台灣文壇的反應甚為類似，但兩人的反應卻甚為兩極。²⁷ 張赫宙認為這些文壇的批評，乃是源自於朝鮮王朝時代的「黨爭」和朝鮮民族「遺傳天性」，甚至在〈訴諸朝鮮知識份子〉中指出朝鮮人「扭曲」、「激情性」、「不穩重」、「缺乏正義感」等缺點，如此肆

26 同註25，頁49-86。

27 王惠珍，〈殖民地文本的光與影——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為例〉，《台灣文學學報》13號（2008.12），頁205-243。

無忌憚的批評，引來朝鮮知識份子們的一陣撻伐，但卻也同時引起朝鮮知識份子內部對朝鮮封建性和民族性的更深入的思考。²⁸

張赫宙雖受到朝鮮文壇的排擠，雙方的關係有著高度的對立緊張關係。但無法否認的是，他在戰前朝鮮、日本文壇，甚至是整個帝國的日語圈內，一直被視為朝鮮半島的代表性作家。朝鮮方面，《三千里》等雜誌的編輯，如金東煥和俞鎮午等人由於惜才愛將，仍與他保持較親近的關係。日本方面《文藝首都》和《文學案內》等同人誌由於理解他的處境，也與他保有一定的交流關係。²⁹他獲獎之後，改造社極力包裝推銷他作為朝鮮代表的作家形象，他儼然成為日本帝國境內「和製・國產」的代表性日語作家。³⁰1930年後期他的創作活動已達高峰，成為在日朝鮮作家的代表，進入戰爭動員期日本當局不可能將他「閒置」，而不善加利用，專職寫作的他為了生活之需，只能因勢利導隨波逐流，順勢走上了「親日」作家之途。

戰前因民族立場問題而被烙上「親日」作家的標籤，戰後在祖國已無安身之處，所以他選擇和日本的命運同舟共濟，以日本文壇作為他繼續寫作的文化場域。但因其是在日朝鮮人的身分而游移於日本文壇邊緣，在滾滾的歷史洪流成為「被選擇遺忘」的作家，「此處有著在日本文學界始終擔任丑角的張赫宙的悲哀。」³¹但這也是殖民地作家戰後共同面對最為無奈的悲哀，他雖然不似台灣日語作家在戰後需面臨「跨語」的問題，得以繼續書寫，但「讀者不在」卻是另一個他必須克服的難題。

三、張赫宙與台灣文壇的互動關係

台灣割日（1895）較日韓合併（1910）約早15年，1937年皇民化運動開始

28 南富鎮著，〈朝鮮文壇と朝鮮民族性の論争〉，《近代日本と朝鮮人像の形成》（日本東京：勉誠出版社，2003.07），頁129-149。

29 同註22。

30 高榮蘭，〈交錯する文化と欲望される「朝鮮」——崔承喜と張赫宙の座談会を手がかりに〉，《語文》136號（2010.03），頁69-84。

31 白川豐，〈張赫宙研究〉，《殖民地朝鮮の作家と日本期》，頁188。

之際，台灣「國語解者」已佔全人口的37.38%，而韓國1938年才達到12.3%。³² 在台灣日語創作的比重亦逐年增加，1937年《臺灣新聞雜誌》的「漢文欄」遭廢止，四〇年代的台灣文壇主要由台、日的日語作家共構而成，但在朝鮮全然以日語創作的作家比例不似台灣這麼高，1941年為止朝鮮語文壇依然存在，而知名的在日朝鮮作家如張赫宙、金史良皆以雙語創作。可見，台、鮮作家所面對的文壇環境與創作語言的問題迥然有別。

戰前在日本出現過兩次的「朝鮮熱」，第一次是出現在1910日韓合併前後，第二次則出現在中日戰爭至太平洋戰爭期間。很顯然地這兩次的「朝鮮熱」背後皆有其政治性的操弄，被批判是「官製的『朝鮮熱』」。³³ 根據大村益夫與布袋敏博所編製的目錄可知，當時日譯朝鮮文學的篇目與實際篇數消長的具體情況。³⁴

日本文壇的徵文活動雖然是出版媒體對文學市場的宣傳策略和噱頭，獲獎並不能作為作家名利雙收的保證，³⁵ 但卻直接刺激殖民地的日語新世代以日語創作前進中央文壇的慾望。張赫宙1932年獲得《改造》懸賞創作獎的意義，除了催化朝鮮文壇的青年以日語創作競相前進中央文壇，³⁶ 同時，他也成為台灣文學青年競相仿效的對象，如楊達、張文環、翁鬧等人也曾積極參加日本中央文壇的徵文活動。1934年1月《中央公論》擴大發掘新人，舉辦「論文・中間物・創作」懸賞徵稿，《中央公論》（1934年4月、臨時號）刊載柳斗基〈朝鮮の問題の行方〉的佳作作品，根據〈選者之言〉³⁷ 中提到：「特別的是，來自朝鮮、台灣人們悲痛慘叫」的作品很多。同年，張文環亦寫了〈父親的容顏〉

32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03.02），引自《朝鮮事情·昭和十五年版》（朝鮮總督府編，〈參考統計表〉，頁10）之數據。

33 朴春日，〈“韓国ブーム”の虚像と実像〉，《〈増補〉近代日本文學における朝鮮像》（日本東京：未來社，1985.08），頁327-378。

34 大村益夫、布袋敏博編，《朝鮮文學關係日本語文獻目錄》（日本東京：綠蔭書房，1997.01）。

35 紅野謙介，〈投機／思索の対象としての文学——懸賞・小説・相場〉，《越境する知5 文化の市場：交通する》（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1.06），頁127-152。

36 南富鎮著，〈第二章植民地の言語空間〉，《文学の植民地主義——近代朝鮮の風景と記憶》（日本京都：世界思想社，2006.01），頁76-141。

37 〈選者の言葉〉，《中央公論》臨時増刊号（1934.04）。

參加同年8月舉行《中央公論》的「創刊五十週年」的小說徵選活動，並於1935年1月得知獲得佳作，但作品卻未見刊登。另外，1937年，龍瑛宗之所以參加《改造》懸賞創作獎徵稿活動，主要亦是受張赫宙獲獎消息的鼓舞。³⁸可見，張赫宙的獲獎對於殖民地文壇日語世代的文學青年前進中央文壇，起了相當大的激勵作用。

張赫宙獲獎後隨即成為殖民地作家代表文壇的寵兒，台灣的文學雜誌亦向他邀稿，他也陸續在台灣的刊物上發表三篇短文。³⁹但這些文字大都是他回應主編的提問，而未見有其他創作性的文章，這或許是因為台灣的文藝雜誌主要是同人性質刊物有關吧。

縱然如此，從《台灣文藝》的〈編輯後記〉、〈二、三言〉等類似文壇消息的短文中，可知台灣文壇的人士相當關注著朝鮮作家在中央文壇的活躍情況。如吳坤煌在台灣文聯東京支部第一回茶會中，提及1935年台灣文藝界的動向，提到：

例如文評所介紹的楊逵，或入選新年《中央公論》的懸賞佳作第二名的張文環，特別逼近日本文壇的水準。又有兩三位隱身的同志以《文藝春秋》與《改造》的牙城為目標。大家都極其奮發努力，因此確信不久的將來，在他們之中將出現如朝鮮張赫宙般的作家。⁴⁰

但文壇人士卻也呼籲：

創作這個島嶼赤裸的樣貌，發揮鄉土特色是作家們的任務。絲毫沒有必要一味地抱著日本文壇的屁股，台灣有台灣特有的藝術和文學。

38 龍瑛宗，〈怎麼樣看也不懂〉，《開南校友通訊》445號（1986.07.15）。

39 張赫宙，〈台灣の新文學に所望する事〉，《台灣新文學》創刊號（1935.12），頁29、〈明信片〉，附錄《新文學月報》2號（1936.03），頁3、〈諸家芳信〉，《文藝台灣》2卷1號（1941.03），頁60。

40 吳坤煌，〈台灣文聯東京支部第一回茶話會〉，《台灣文藝》2卷4號（1935.04），頁24-25。

勿模仿朝鮮的張赫宙!張赫宙到底是因朝鮮式而偉大，島上終究非得產生台灣式的張赫宙不可。

張赫宙是偉大的作家，這個島嶼出現許多比張赫宙更偉大的作家吧。⁴¹

誠如以上的引文，1930年代前期多數的文學青年將張赫宙視為仿效的對象，競相努力前進中央文壇，但他們並未忘卻作為被殖者的主體性和使命感，試圖強調表現充滿多義性的「台灣特色」，因此《中央公論》的評選者才會聽到那麼多來自殖民地的「慘痛叫聲」，或是感受到作品中提供的「異國想像」等。

誠如前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至太平洋戰爭前，中央文壇出現第二波官制的「朝鮮熱」，在回顧昭和15年（1940年）⁴²台灣文壇之際，張星建與新垣宏一也紛紛提及朝鮮作家在中央文壇的表現。張提及，「事變發生以來，創作、戰爭文學、評論、翻譯文學，或是舊作改寫在中央文壇出現罕見的盛況。與半島文壇的進入也很醒目，相較於此，台灣文壇看來顯得低調。」新垣「同時深切地期盼，本島人作家們能寫得出不遜於朝鮮作家的豐麗日文文體。」黃得時在1941年回應〈新體制與文化〉雜誌專題時，寫到：「後生小弟朝鮮不知何時竟超越兄長，想長大成人。想來真是丟臉啊。」⁴³他們觀察到的，並非半島朝鮮文壇本身，而是在日朝鮮作家張赫宙與金史良等人在《改造》、《文藝》、《新潮》、《文學界》等的活躍情況。同時，1940年亦由張赫宙主編了《朝鮮文學選集》⁴⁴（翻譯創作集）三卷，由赤塚書房陸續在日本出版，楊雲萍的藏書中亦可見其書影。可見台灣日語世代對朝鮮文學的認識，主要乃是以「日語」為媒介，閱讀朝鮮日語作家的創作和日語譯介的朝鮮文學。

從戰時的出版情況觀之，用紙管制的情況在法律上，雖宣布從1938年8月開始，但實際上用紙配給是從1941年6月才開始執行。1942年3月開始書籍全部

41 〈二言、三言〉，《台灣文藝》2卷7號（1935.07），頁131。

42 編輯部，〈昭和15年度の台湾文壇を顧みて〉，《台灣藝術》1卷9號（1940.12），頁20-22。

43 黃得時，〈新體制と文化〉，《文藝臺灣》2卷1號（1941.03），頁106-103。

44 張赫宙編，《朝鮮文學選集》3卷（日本東京：赤塚書房，1940.03、09、12），共收入翻譯作品11篇，創作5篇。

採發行認可制，比例總數也逐漸遞減⁴⁵。根據白川的統計張赫宙在日出版書籍的冊數，從1941年：8冊，1942年：4冊，1943年：3冊，1944年：1冊，亦有逐年減少的趨勢，但就發行部數42年的《和戰何れも辞せず》、《わが風土記》（隨筆集）各一千五百部，1943年的《開墾》四千字、《浮沉》三千部，1944年的《岩本志願兵》則印製了一萬部，卻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如此的數字成長雖無法單純地以讀者數的成長解釋，但這顯然是因應日本國策之需，特別處置的結果，而張赫宙在日本的「利用價值」亦因戰爭的結束而告終。⁴⁶從時間的推移、出版冊數與部數的變化，可以發現作為殖民地作家的他在日本文壇有其特殊的文化位置，從他來台出版書籍的意義，也可觀察到他緊隨帝國擴張的腳步，擴張個人書籍出版的空間。

戰爭末期紙張配給甚為吃緊，張赫宙竟得以將充滿國策宣傳性質單篇作品集結成《新出發》（《新しき出發》），選在殖民地台灣刊行出版，甚至一刷即發行五千部。該書主要收錄為紀念京城因總力戰實施徵兵制而寫的〈新出發〉（〈新しい出發〉），和第二次視察滿洲開拓地，描寫滿洲建國後農民的喜悅的〈某篤實農家の述懐〉（〈ある篤農家の述懐〉）、〈懷德農村〉、〈在遼河〉（〈遼河にて〉）、〈皇恩〉共六篇時局・國策的作品。根據〈後記〉的記載：

我想這本書讓能和朝鮮一樣走向大道，在不遠的將來內台一體，內台鮮一元化的台灣同胞讀到，我甚感高興、有幸。

戰局吃緊，但我們更加以充滿歡愉的心，忍受痛苦與試煉。

南國的香氣四溢，色彩鮮豔的台灣近作實在是賢實，皆是優秀之作。最近因為我想到近來數年間全日本的傑出小說大半是台灣的作品，我這本書可否滿足讀者，甚為危懼不安。⁴⁷

45 布川角左衛門，〈戰時の出版事情〉，《文学》29卷5號（1961.05），頁131-151。

46 白川豐，〈戰前日本文学界の状況と張赫宙〉，《殖民地朝鮮の作家と日本期》，頁186。

47 張赫宙，〈あとがき〉，《新しき出發》（台北：大木書局，1944.11），頁227-229。

文中雖有不少溢美之詞，但顯然他試圖將他戰時的「利用價值」轉嫁至台灣，出版自己的作品集再行利用。一刷的發行部數較同年出版的呂赫若《清秋》的三千部還多，但台灣讀者對這本選集的反應如何？在台灣的評論家的論述中尚未見有相關書評，因此目前讀者反應尚不得而知。

但1944年張赫宙曾為了在台出版的版稅問題，寫了一張明信片請託長崎浩轉交給龍瑛宗，其中內容的譯文如下：

拜啟 之後好嗎？和芹澤先生偶而會閒聊。在台灣文藝上拜讀你的作品甚為懷念。接著，突然想拜託你。由台北太平町三之九之十八大木書房（李清輝）刊行拙著《新しき出発》。但因為未寄來版稅，有些按耐不住。十月初請款，說十月底，過了十一月底，到了年底，以再刷為由說一月付款，尚未寄來。因為書年初就送到，看到版權頁是十一月五日發行。當然已經非支付不可，若是在東京，年內的事情年底為止應該結清。之後還有兩本書要出，不願意沒信用。但怎樣都很奇怪。到了今年完全沒有回應。雖說我在版權頁第一次知道這位台灣青年（本名也是）。因為已蓋了七千部檢印（千七百五十圓）送出。可以幫我交涉這件事，並以航空信回覆？⁴⁸

從這張明信片的內容可知，他與龍瑛宗同是《改造》懸賞創作獎得主，芹澤先生應該就是芹澤光治良，龍瑛宗第一次訪日時曾與他見過面⁴⁹，可能因為三人同是「改造」之友的關係，因而請託龍代向大木書房負責人李清輝詢問究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多數作家深感時局要求日形嚴苛，很多日人作家對未來深感茫然，以至於無法安穩地書寫正規的文學作品，因此純文學的創作出版甚為

48 明信片的外面寫著以下的日期與地址：台灣台北市福住町三ノ／長崎浩様方／龍瑛宗様

東京中野 新山通三ノ二六 一月二十三日 張赫宙

49 王惠珍，〈揚帆啟航——殖民地作家龍瑛宗的帝都之旅〉，《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期（2006.04），頁29-58。

蕭條。⁵⁰更何況是以版稅為生的在日朝鮮作家張赫宙，他應該承受更大的生活經濟壓力吧，所以才急需這筆出版稅收。另外，他似乎有計畫想繼續來台出版發行他的著作，只是最後日本戰敗出版計畫，不得不終止。總之，他為了生計追隨日本帝國大東亞共榮圈擴展的腳步，計劃出版自己的著作流通於日語帝國境內，以此尋求生存之道，台灣成為他南進的前哨站，大木書局共印行七千部販售，莫過於是因看重張赫宙在台的知名度吧。

四、台灣作家與張赫宙的比較

無論台灣或是日人評論者皆喜好，將同是殖民地出身的台灣作家與朝鮮作家張赫宙相提並論，除了他們都是同時代的殖民地日語作家之外，主要的原因應是他是最早成功登陸中央文壇的人物，具指標性意義。以下將列舉台灣作家楊遠、龍瑛宗、呂赫若、張文環等人，說明他們與張赫宙之間的對照比較關係，進而凸顯張赫宙的作家形象與台灣作家的對應關係。

（一）普羅作家楊遠與張赫宙

張赫宙在獲獎之前，即在日本左傾的雜誌上發表過作品，在他之前的朝鮮作家也大都是在日本普羅文學運動的支持下，於普羅系統的雜誌中發表作品，但他是獲得日本全國性重要綜合雜誌《改造》懸賞創作獎，第一位正式進入日本中央文壇的朝鮮作家。⁵¹當他想上京一圓他的作家之夢時，有些日本知名作家卻不甚贊成，如前述的芹澤光治良，因擔心他被日本文壇的風氣影響，而提出以下的建言：

我曾經對他忠告，為了作家的成長，離開鄉土進京是不行的。因為再怎樣擁有柔弱的靈魂與性格，得在家鄉才得以反應出鄉土的氣味，代替悲

50 岡野他家夫，〈第五章 昭和時代中期〉，《日本出版文化史》（日本東京：春步堂，1959.07），頁445。

51 任展慧，《日本における朝鮮人の文学の歴史—1945年まで—》（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出版社，1994.01），頁202。

慘的民族發出激烈的憤怒。但若住在東京，其敏銳將轉弱之故，或許只受到各樣的影響便被壓倒，處女作以來作家的特長在心底即被毀壞殆盡。同樣身為作家的我發自疼愛而感到恐懼。本應代表半島大眾的作家離開半島，移住中央而磨滅自己的藝術，並非只是日本讀者的損失。在地方將鄉土的靈魂在我們的文學裡靈活運用是何等地重要，而未必非得在日本不可。⁵²

最後，張赫宙仍毅然決然地進京，在改造社的包裝行銷下，很快地進入文藝界。他自1934年的作品〈ガルボウ〉（《文藝》，1934年3月號）、〈葬禮之夜發生的事〉（〈葬式の夜の出来事〉，《文藝》，1934年8月號）、〈上墳去的男人〉（〈墓参に行く男〉，《改造》1935年8月號）等作品風格已脫離〈餓鬼道〉的作品世界，以處理異國情調、題材的趣味性為目的，傾向於善巧細膩地處理風土趣味，開始濃妝豔抹。⁵³換言之，以日本主流媒體作為發表舞台的張赫宙，在進京後雖曾面臨一段寫作的低潮期，甚至無法動筆的困境，⁵⁴但為求立足文壇謀生，滿足日本讀者對朝鮮異國的好奇，轉而在日本的雜誌上陸續發表介紹朝鮮風土的作品，因此遭受普羅系作家的質疑非議，如德永直（1899-1958）提到：「朝鮮作家中，張赫宙君最近漸往小資產階級的題目轉移。」⁵⁵

楊逵1934年以〈送報伏〉獲選《文學評論》第二獎，雖稍晚張赫宙二年進入日本文壇，但大力推薦〈送報伏〉的德永直卻將楊逵與張赫宙相提並論，藉此批評張赫宙是個容易動搖的懦弱男子：

出現來自台灣名叫楊逵的年輕人，他當作家雖尚不及你，但卻非常牢靠而有魄力。他的〈送報伏〉在本島人之間引起相當大的迴響，因而在台灣發行的新聞上連載〈送報伏〉的評論，被命令刊載中止，報社只能自

52 芹澤光治良，〈文藝時評〉，《都新聞》（1937.05.04）。

53 同註51，頁207。

54 張赫宙，〈私の小説勉強〉，《文藝》11月號（1939.11）。

55 德永直，〈プロレタリア文壇の人々〉，《行動》2卷12號（1934.12），頁188-191。

行發出通告而已，對你而言他是個難得的競爭對手。⁵⁶

之後，壺井重治也針對當時刊載於《文學評論》的楊遠的〈送報伙〉與呂赫若的〈牛車〉，與同是殖民地作家的張赫宙進行比較評析。壺井認為前兩位的作品「質實和樸素」，「與他們相較，同是殖民地作家的張赫宙卻是非常不一樣的類型。檢討文章的相異之處由何而來，的確是一個有意義的題目。⁵⁷」山口守認為這與作品展現異國情調的濃淡有關，已超越作家個性差異的問題，因為異國情調的認知是想像／創造殖民地時，重要的手段。⁵⁸但若進一步區分刊載作品的雜誌性質與讀者問題，相較於楊遠，已是專業作家的張赫宙顯然對日本的閱讀「消費大眾」的興趣高過於「普羅大眾」，因此1934年的張赫宙早已順勢變奏展現其「異國情調」滿足日本讀者的興趣，張、楊兩人的文壇位置是有所差異的。

針對德永的批評，張赫宙不甘示弱隨即撰文駁斥：

因為被你算是文壇中之人，感到意外而高興。但因我是朝鮮人而行動就得特別果敢，因為是殖民地人就特別暴亂，這也未免要求得太過了！誠如你所言，以台灣作家楊遠的〈送報伙〉為例，舉出由於刊載它的批評台灣報紙因而被命令中止刊載，而引起我的競爭意識，這不會太幼稚了嗎？例如我的〈被追逐的人們〉（《改造》）和〈奮起者〉（《文藝首都》）皆被禁刊，朝鮮當局逼迫剝奪我的自由，和讓我發表〈我的文學〉（《文藝首都》）的保高德藏兄被叫到警視廳諸如此事。看看朝鮮人和台灣人何者遭到更多的禁刊和限制，如此的口吻也未免太過輕視殖民地的人吧？我啊更不想因為楊遠氏是台灣人而與他競爭。我只是想作為一個人、作為一位作家如石坂洋次郎、島木健作、丹羽文雄般同等被

56 同註55。

57 壺井重治，〈文藝時評〉，《文學評論》2卷2號（1935.02），頁103-107。

58 山口守，〈創造／想像される植民地——楊遠と張赫宙〉，《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

看待。（但目前楊氏未有大的本事。）

為什麼不能理所當然地視張赫宙為一位作家？以因為是朝鮮人之眼看待，是否侮辱了他？⁵⁹

張赫宙的言詞表達，雖甚為直接激烈，但卻赤裸地呈現出殖民地作家進入中央文壇後的苦境，他不斷地被人從民族、階級等立場進行檢視，作家身分與文學本質的意義已成為支微末節，這也是殖民地出身的文學家難逃的宿命與課題。另外，他們兩人的對話提醒我們，殖民地作家作品的禁刊問題，不只在殖民地，在日本文壇中仍未被寬待，該問題在殖民地近代文學發展史上，有其共通相似之處，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

楊逵在獲獎之際，無論日本評論者對張赫宙褒或貶，他儼然成為評比殖民地作家的指標性人物。至於台灣評論者賴明弘在〈送報伏〉得獎後的評語言：

我們首先祝賀台灣文學的新發展。當然我們台灣人並非以被日本作家認可而滿足。不可否認的〈送報伏〉是篇未成熟的新作品。創作筆法幼稚是無法與張赫宙比較的，但張赫宙的作品不似楊逵那樣逼真地處理殖民地歷史的現實。因此足以認定〈送報伏〉的價值。⁶⁰

賴明弘指出〈送報伏〉所欲揭露的殖民地問題，但他對兩人的比較與日本評論者相去不遠。

張赫宙並未因德永的評比，而與楊逵之間產生什麼嫌隙。他仍回覆來自楊逵主編的《台灣新文學》的明信片問答。其中，問題有二「一、殖民地文學應前進之道。二、對在台編輯作家讀者的訓言」。⁶¹他針對前者進行回覆，認為將殖民地台灣或朝鮮產生的文學皆冠上「殖民地文學」，範圍太過廣泛，也無

59 張赫宙，〈私に待望する人々へ——德永直氏に送る手紙——〉，《行動》3卷2號（1935.02），頁190。

60 賴明弘，〈讀者評壇——殖民地文學を指導せよ！〉，《文學評論》1卷4號（1934.11），頁37。

61 明信片問答〈台灣の新文學に所望する事〉，《台灣新文學》創刊號（1935.12）。

意將朝鮮文學以此特殊名詞限制於狹隘的定義中，但若以題材來定義文學的話，或許可以接受，若是要強調朝鮮殖民地文學的文學特徵，應該指的是描寫朝鮮普羅階級的普羅文學。「今後應前進的道路也應與其他的普羅文學配合步調，共同前進。」⁶²張赫宙顯然意識到《台灣新文學》的普羅傾向，刻意強調殖民地普羅階級的連帶關係，內文夾有一些刪節號，其中的內容不得而知，或許是主編為避開檢閱所進行的處理吧。

相較兩人的文學活動，他們出道之初皆與日本普羅文學作家們的互動來往甚為密切。在他們的提攜下，張赫宙代表朝鮮，楊逵代表台灣分別在普羅系的雜誌如《文學案內》和《文學評論》等上積極發表作品，成為1933年至1935年左右殖民地作家在日本雜誌上發表的第一個高峰期的代表性作家。⁶³因此胡風之所以在1936年出版《弱小民族小說選》⁶⁴中，分別選譯了張赫宙〈山靈〉（馬荒譯）和楊逵〈送報伙〉（胡風譯），正反映出他們在當時日本文壇中分別是代表弱小民族的作家。

兩人雖同樣以殖民地風景作為書寫題材，但與殖民地文壇的在地關係卻相差甚遠。張赫宙雖然在三〇年代仍以朝鮮語創作，但因春香傳公演等問題與朝鮮文壇發生嫌隙漸行漸遠，最後完全投身日本文壇一展文學抱負，戰時積極呼應國策文學，戰後以在日朝鮮作家的身分追求日語文學的成就。相對於此，戰前楊逵雖曾以台灣話文創作，但是卻以日語作為他的主要的文學創作語言，戰後與其他台灣作家一樣積極學習中文，繼續他的社會主義運動。文學事業對楊逵而言，乃是他人道社會主義實踐的工具之一，因此得獎後回歸台灣文壇積極

62 張赫宙，〈台灣の新文學に所望する事〉，《台灣新文學》創刊號（1935.12），頁29。

63 白川豐，〈日本雜誌の發表された旧植民地作家の文学〉，《殖民地朝鮮の作家と日本期》，頁2-20。

64 胡風編，《弱小民族小說選》（中國上海：生活書店，1936.05）。根據譯者馬荒在文末附註的說明可見〈山靈〉之所以被譯出的理由，如下：

張赫宙是日本文壇上最活躍的朝鮮作家，在改造社有創作集。本篇就是從那裡譯出的。一個家庭底破滅的經過。一個少女底哀史，這裡面映著朝鮮農民底悲劇的命運。作者是一個自由主義的作家，他寫的是一首低音的哀歌，但這悲哀是從那裡來的，他也明白地指出了。從這種悲慘的生活裡而湧出的熱流，在作家底其他作品如餓鬼道和新人李北鳴等底作品裡也可以看到的。

在去年七號文學上，黃源先生介紹有同一作者底權那個傢伙。

地扮演與日本文壇交通的橋樑，特別是在主編《台灣新文學》時，更是積極介紹引進中央普羅作家們的言說，企圖提昇雜誌的質、量。戰後初期楊達亦同樣地積極與中國左翼人士進行交流，投身於雜誌媒體的編纂與翻譯工作。總而言之，他們在得獎後的文學經歷活動和創作風格相去甚遠，兩人之所以會被並列評比對象，主要是聚焦在他們處理受壓迫的殖民地農民生活等題材，並受到日本普羅文學界特別的關注與提攜等經歷。

（二）《改造》懸賞創作獎得主龍瑛宗與張赫宙

龍瑛宗1937年榮獲《改造》懸賞創作獎時，媒體稱他是「台灣的張赫宙」，⁶⁵受到文壇眾多的注目，但與張赫宙同樣並未獲得殖民地文壇的肯定。他在前往領取《改造》懸賞創作獎之前，曾寫信給張赫宙向他諮詢有關日本文壇的狀況與動態，張建議他可以直接拜訪保高德藏。⁶⁶因此，在抵達東京之後，龍便前往文藝首都社拜訪保高，備受照顧，並為他介紹文藝界的友人。

《文藝首都》的總編保高德藏因青少年時期的朝鮮殖民地經驗，使得他對殖民地作家特別有好感並對到日本內地尋求發展的文學青年關照有加，除了照顧他們的生活層面之外，還提供雜誌版面供作他們發表的園地，如張赫宙、金史良初至日本之際，皆受到他親切的照顧。⁶⁷龍瑛宗在帝都之旅返台後，仍經常受到保高的書信鼓勵，並透過《文藝首都》的發表與日本同人進行交流，並積極撰稿在日發表，同時，也在德高保藏的引薦下與金史良有書信的交通往來。⁶⁸

殖民地作家在日的活動大都受普羅文學運動家的協助，被收編成為日本普羅文學運動的一環，建立之間連帶提攜的關係，如楊達與日本文壇的關係即是如此。但龍瑛宗與日本文壇的關係並非循此路線，他是透過獲得《改造》懸賞

65 「台灣文壇の新人／颯爽、檜の舞台に登場／劉君のパイパイのある街／「改造」懸賞創作に入選」，《台灣新民報》（龍瑛宗的剪報資料）。

66 1937年6月14日張赫宙寫給龍瑛宗的信件中，為龍瑛宗所藏信件。

67 保高みさ子，《花実の森——小説文芸首都》（日本東京：立風書房，1971.06），頁20。

68 王惠珍，〈龍瑛宗と《文芸首都》同人との交流〉，《天理台湾学会会報》12集（2003.06），頁71-84。

創作獎的路徑，在得獎訪日期間建立與日本文壇的人脈關係。⁶⁹這與朝鮮作家張赫宙進入日本中央文壇的情況較為類似，但張赫宙在獲獎後便辭去教職，最後上京專心發展他個人的文學事業。龍瑛宗則因擔負家計問題，不得不選擇歸台，使他未能一圓成為文學家的夢想。

改造社的山本實彥社長與台灣淵源頗深，他的父親因牡丹社事件曾追隨西鄉從道來台卻戰死石門，他自己1914年因「台灣事件」連坐入獄過。龍瑛宗返台後他亦鼓勵有加，曾多次以書信與龍保持連繫，⁷⁰但因龍瑛宗選擇返台，亦非專職作家，使得改造社無法再度複製出「台灣的張赫宙」。

朝、台近代文學發展史中，留日學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朝鮮文學者中約有72%具有留日經驗，⁷¹但張、龍兩人皆未具留學經歷，心理上多少都有其學歷不如人的自卑之處。但龍瑛宗個性較為木訥內向，出身台灣客籍行商之子的關係，他對於來自台灣文壇的批評反應，不似張赫宙般因憤懣而直接反擊，而是選擇沉默以對不願辯解。即便四〇年代因誤解，而遭受以閩南人為主之《台灣文學》團體排擠，但他卻以文學創作力證明自己在文壇的重要性。總之，龍、張的學歷出身、獲獎經歷、與山本實彥和保高德藏曾維持過良好關係等雖然甚為相似，但因個人的性格與人生抉擇的差異，獲獎後在文壇上各自譜出不同的曲調。

（三）文學才子呂赫若與張赫宙

關於呂赫若的「赫」字，巫永福曾回憶到1935年他因台灣文藝聯盟雜誌《台灣文藝》的事，訪問中央書局經理張星建時，偶遇呂赫若進行了以下一段對話：

赫若說：「我的本名石堆很粗俗，故以赫若為號並為筆名。」針對他的筆名我說：「很有朝鮮名小說家張赫宙的味道。」赫若一聽大笑起來答

69 同註49。

70 同註49。

71 同註34，頁3。

道：「是啊，我比張赫宙年輕，所以名赫若，日本語的『若』是年輕的意思。」⁷²

呂赫若的「赫」字的源由顯然是經巫永福即興詮釋而出，但也顯示出張赫宙的文名在他們的印象中甚為鮮明，而且是位深具影響力的殖民地作家。

1943年高見順在評論呂赫若的小說〈合家平安〉、〈月夜〉之際，曾說道：

我想起朝鮮作家張赫宙君，因為張君是我的友人。而之所以會想起張君是因為呂赫若與張君的作品的味道相似，因而覺得呂赫若和張君有著同等的力量（有些失禮的說法）。⁷³

上述的兩篇作品中，呂主要是處理台灣傳統家庭因封建性和後進性，所帶來的悲劇問題。因此，所謂的「味道相似」，或許指的是呂赫若與張赫宙初期作品一樣，針對殖民地朝鮮、台灣的家族關係、風土民情多所著墨，並凸顯因傳統「封建性」導致生命的挫敗與人物的不幸，從中展現作者批判的「力量」。如張赫宙〈山靈〉中描寫淪為火耕民的少女吉仙一家，因地主的壓榨使其陷入極端貧困的悲史。同樣地，呂赫若的〈月夜〉亦描寫翠竹婚姻失敗受虐的悲史，〈合家平安〉則是諷刺大家族為滿足家長吸食鴉片之陋習，為求合家平安而犧牲養子有福的故事。兩人在敘述悲劇命運的過程中，具現了作家的批判性。只是1943年的張赫宙的文學早已向國策性文學傾斜，可能只因兩人同是殖民地作家，小說題材有其相似度才讓高見順會有如此的聯想吧。

台北帝大國文學教授瀧田貞治亦在呂赫若的《清秋》序文⁷⁴中特地援引高見順的讚賞之語「作為說話體小說家的呂赫若與張赫宙有同等力量。」但文末他乃回歸殖民地的國語問題，希望作家能克盡協力官方普及國語之責。可見，當時與張赫宙相提並論，是一種推舉肯定的表現。

72 同註13。

73 高見順，〈小說總評——昭和十八年上半年の台灣文學——〉，《台灣公論》8卷8期（1943.08），頁86-92。

74 呂赫若，《清秋》（台北：清水書店，1944.03）。

(四) 台灣文壇領導者張文環與張赫宙

張文環是1940年代前期台灣人文學集團中重要的領導人物，對台灣作家文學團體甚為友善的台北帝大教授中村哲在評論點名台灣作家之際，提及：「希望張文環能自覺到，他是台灣文壇中，唯一可與朝鮮的李光洙或張赫宙相抗衡的，不可多得的人才。」⁷⁵ 李光洙1917年於《每日申報》發表朝鮮近代文學第一篇長篇小說《無情》，並從事報紙編輯工作，鼓吹獨立運動。但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因入獄生病而被迫轉向，之後，擔任朝鮮親日御用團體「朝鮮文人協會」會長改名為香山光郎，積極參與戰爭宣傳工作，並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他在韓國近代文學發展方面，對韓國其他作家的影響力甚大，被尊稱為韓國近代文學之父。在此中村之所以提及李、張二人，其中是否也暗示著台、朝作家間的競爭對應關係，並藉此激發張文環展開對殖民地文壇的影響力？

就文學風格而言，戰後王詩琅對張文環的文風評價，竟也以張赫宙為評比標準：

記得遠在日據時期，筆者讀過他（張文環）的作品所獲的印象，覺得有如在日本文壇活躍的朝鮮作家張赫宙初期的作品的風味，縱然內容、題材，描寫手法以及意義各不相同，但同樣粗獷，猶如天馬行空，一種壓迫感令人非讀到結末不忍掩卷的力量卻是沒有二致的。兩人的作風都是『粗線條』的。⁷⁶

王詩琅雖是進行印象式評論，聯想到的竟是戰前日語世代們所熟知的朝鮮作家張赫宙。以「粗線條」概括他的文學風格和魅力，而非以民族立場等意識型態來評斷他的民族立場。可見，在他的殖民文學記憶裡，張赫宙是位「成功」的殖民地文學家的代名詞。

75 中村哲，〈昨今の台湾文学について〉，《台灣文學》2卷1期（1942.02），頁2-6。

76 王詩琅，〈粗線條的人粗線條的作品〉，《台灣文藝》59期（1978.06），頁115-118。

綜觀以上戰前日、台評論者，無論是戰前或戰後大都以張赫若初期的創作內容和文學風格為評價標準。對於四〇年代的張赫宙的親日言行並未多加評擊，這理應是同時代的殖民地作家，共同經歷過戰時動員體制，因而對他言行多了一些理解與包容。戰時體制下的總動員猶如一個大渦輪吸盤，全部的人力物資甚至人的言動思想，皆被捲入其中，而無法顧及個人意願。誠如張文環在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中的宣示「台灣沒有非皇民的文學，如有寫非皇民的文學者都該槍殺。」⁷⁷般的發言方式，足以讓人感受到戰爭末期作家與當局之間的緊繃關係，作家必須得如此徹底的自我宣示，方能爭取到可能的言說空間。更何況以寫作為業的張赫宙，版稅稿費是他唯一的經濟來源，從普羅的同伴作家，到為求續留在日本文壇發展，轉而將作品塗抹上「異國情調」的色彩，戰爭末期又變奏吹起號角，書寫符合國策的論著。

台灣日語世代的作家只要一提及朝鮮作家，幾乎都會聯想到「張赫宙」這個名字，因為他曾是鼓動殖民地作家前進日本中央文壇的指標性人物。這可能是張赫宙始料未及的，但歷史卻讓他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這位成為文學家的「夢想」代言人到戰後所要背負的歷史責難，卻是我們難以想像的。雖然在台灣未出現如此「成功」的專職殖民地作家，但卻讓業餘的台灣作家戰時無需只仰賴版稅度日，多了一些與當局協商的言說空間，這或許另一種「有幸」。雖然張赫宙曾期盼以「一位文學者」的身分，被日本文壇被認可，但「在日朝鮮人」的種族高牆卻始終難以翻越，真正的文學夢想也終究難以實現。

五、結語

從日本文壇的觀點看張赫宙，他是從殖民地來的「朝鮮」作家；從朝鮮文壇的視角觀看，他是「在日」朝鮮人作家。在戰前他更是日本帝國的「日語」作家。在大東亞共榮圈內，張赫宙的消息與中譯文章常見於「親日」雜誌中。換言之，戰時他被形塑成殖民地協力作家的範本，成為大東亞日語圈內知名的

77 〈台灣決戰文學會議〉，《文藝台灣》終刊號（1944.01），頁32-40。

朝鮮代表作家，帝國下朝鮮文化的代言人。

就張赫宙文學生命歷程而言，他善巧地趨利避害順勢而為，「書寫」是他唯一不變的生命實踐方式。即使題材一再轉變，但他總基於個人的體驗不斷地書寫。無論書寫朝鮮農民、滿洲國的朝鮮移民、在日朝鮮人，張赫宙大多以「朝鮮」的觀點出發，在日的位置進行文學創作，若以民族主義的觀點出發，他的作品頗多爭議之處，但若從他所設定「在日」的觀察視點觀之，他因位於帝國與殖民地的夾縫中，反而對於朝鮮民族處境有其特異的觀察視角，這是在閱讀張赫宙文學時，不可忽略的重點。

張赫宙是在戰前唯一成功地與日本出版媒體合作，出版多冊單行本的殖民地作家，無人能出其右。他何以成功地的進入日本文壇發展個人的文學事業，這與昭和時期出版媒體的運作有其密切的關係，但他的「真正」的讀者群究竟在哪裡？相對台灣的南國風情，他的朝鮮半島風情又誘發了日本讀者怎樣的好奇心和新鮮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他在戰時的親日言論在戰後儘管遭受到眾多的責難，但戰後他仍不斷地從事日語創作，對文學的創作堅持已超越文化、國族主義等認同問題，因而白川豐不得不以「知日派」作家來貫串他戰後的文學活動。

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對朝鮮動員更形嚴苛積極，使得日語作家為逃脫差別性的殖民體制而與「內鮮一體」政策起舞，再加上他與朝鮮文壇關係的決裂，轉而選擇服膺國策從事文學宣傳工作，稱職地扮演日帝期待他扮演的角色，四〇年代以後以日語文學作家自居，在日本文壇展開文學活動。無論戰前或戰後台灣文學界對於朝鮮作家張赫宙都有其深刻的印象，但大多仍停留在三〇年代後期活躍於日本中央文壇的殖民地朝鮮作家、戰前台灣作家前進中央文壇競相仿效的人物，亦是評論家比較殖民地作家所標舉的人物。被朝鮮文壇排擠責難親日墮落的張赫宙，顯然並未受到台灣日語世代太多的批評，依舊視他為殖民地作家的代表，這或許是因為台灣讀者毋須顧及朝鮮民族情緒的感受，單就其文學風格、創作體驗與苦惱抒發感想即可。

若從與戰前朝鮮一樣同屬東亞殖民地的「台灣」作為觀察視角的話，張赫

宙文學是日本帝國內的朝鮮文學，而非單純的「在日」朝鮮文學，他是被同時代殖民地作家認定成功進入日本文壇的殖民地作家典範，鼓動殖民地作家前仆後繼進軍中央文壇的重要人物。在戰爭期間也是日本帝國動員多數殖民地作家的人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在九〇年代之後隨著南北對立趨緩，日韓關係日漸改善，韓國學界對於過去的文學研究禁忌越見開放。近年來台灣文學島內殖民時期的東亞區域研究亦有所積累，因此日後在東亞殖民經驗比較研究上，可展開的學術研究對話與交流將更多元，而回歸作家文學本身從近代的觀點進行重層多元的文本分析比較，或許將是可以期待的。



參考資料

一、專書

(一) 中文

- 白永瑞，〈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9.09）
-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11）
- 何鎮華，〈朝鮮現代文學史〉（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04）
-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台北：傳神出版社，1999.06）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03.02）
- 金允植等共著，金香、張春植譯，〈韓國現代文學史〉（中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04）
- 胡風編，〈弱小民族小說選〉（中國上海：生活書店，1936.05）
- 柳書琴等編，〈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活動〉（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04）
- 張赫宙著，范泉譯，〈朝鮮風景〉（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08）
- 趙潤濟著，〈韓國文學史〉（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05）

(二) 日文

- E.クロッペンシュタイン、鈴木貞美編，〈日本文化の連続性と非連続性：1920-1970〉，（日本東京：勉誠出版，2005.11）
- 大村益夫、布袋敏博編，〈朝鮮文學關係日本語文獻目錄〉（日本東京：綠蔭書房，1997.01）
- 大江志乃夫等編，〈近代日本と植民地：抵抗と屈從〉（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05.09）
- 下村作次郎等編，〈台湾文学の諸相〉，（日本大阪：啞啞之會，1998.09）
- 白川豊，〈殖民地朝鮮の作家と日本期〉（日本岡山市：大学教育出版，1995.07）
- ，〈朝鮮近代知日派、苦闘の軌跡：廉想涉、張赫宙とその文学〉（日本東京：勉誠出版，2008.10）

- 朴春日，《〈増補〉近代日本文學における朝鮮像》（日本東京：未来社，1985.08）
- 任展慧，《日本における朝鮮人の文学の歴史——1945年まで——》（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出版社，1994.01）
-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稻鄉出版社，2010.07）
- 岡野他家夫著，《日本出版文化史》（日本東京：春步堂，1959.07）
- 吳密察等編，《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5.05）
- 南富鎮、白川豐編，《張赫宙日本語作家作品選》（日本東京：勉誠出版，2003.10）
- ，《近代文学の「朝鮮」体験》（日本東京：誠勉出版，2001.11）
- ，《近代日本と朝鮮人像の形成》（日本東京：勉誠出版社，2003.07）
- ，《文学の植民地主義——近代朝鮮の風景と記憶》，（日本京都：世界思想社，2006.01）
- 金學鉉編譯，《朝鮮の抵抗文学》（日本東京：柘植書房，1977.02）
- 保高みさ子，《花実の森——小説文芸首都》（日本東京：立風書房，1971.06）
- 栗原彬等編，《越境する知5 文化の市場：交通する》（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1.06）

二、 論文

（一） 期刊論文

- 王惠珍，〈揚帆啟航——殖民地作家龍瑛宗的帝都之旅〉，《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期（2006.04）。
- ，〈殖民地文本的光與影——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為例〉，《台灣文學學報》13號（2008.12）。
- ，〈龍瑛宗と《文芸首都》同人との交流〉，《天理台湾学会會報》12集（2003.06）。
- 白川豐，〈廉想涉と張赫宙——朝鮮近代作家の二つの「生」と文学〉，《朝鮮學報》203輯（2007.04）。
- 布川角左衛門，〈戰時の出版事情〉，《文学》29卷5號（1961.05）。
- 任展慧，〈張赫宙論〉，《文學》33卷11期（1965.11）。

- 林浩治，〈張赫宙論——十五年戦争下の朝鮮人作家の軌跡——〉，《季刊三千里》36號（1983.11）。
- 南富鎮，〈張赫宙文学と近代への挫折〉，《日本文化研究》11期（2000.03）。
- ，〈日本近代文学のアジア（6）張赫宙の朝鮮と日本——日本語への欲望と近代への方向〉，《アジア遊学》52卷（2003.06）。
- ，〈「内鮮結婚」の文学——張赫宙の日本語作品を中心に〉，《人文論集》55卷1期（2004.03）。
- ，〈「翻訳」の政治性——時期における朝鮮文学の翻訳をめぐる時期〉，《静岡大学人文論集》57卷2期（2006.01）。
- 高榮蘭，〈交錯する文化と欲望される「朝鮮」——崔承喜と張赫宙の座談会を手がかりに〉，《語文》136號（2010.03）。

（二）學位論文

- 辛承模，〈植民地日本語文学の混淆性：張赫宙・湯淺克衛の文学を中心に〉（日本：名古屋大學，2007.11）。
- 金淑貞，〈張赫宙文学の研究：「十五年戦争」下の「在日」作家〉（日本：日本大學，2007.03）。
- 白川豊，〈張赫宙研究〉（韓國首爾：東國大學大學院博士論文，1989）。

（三）研討會論文

- 金尚浩，〈楊達與張赫宙普羅小説之比較研究——以「送報伏」與「餓鬼道」為例〉，「楊達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主辦（2004.06.19-20）。